

后唐图籍的聚藏

赵永东

后唐享祚虽仅十余年，但搜访图书却最为努力。

天祐十九年（922年），李存审收镇州，“遣（郭）崇韬阅其府库，或以珍货赂遗，一无所取，但市书籍而已”^①。这是后唐得于梁的最早的一部分图书。《旧五代史》卷54《王都传》载：“都好聚图书，自常山始破，梁国初平，令人广将金帛收市，以得为务，不责贵贱，书至三万卷，名画乐器各数百，皆四方之精妙者，萃于其府。”可见后梁官藏曾有一部分流入民间。就是这个王都，在后唐初立，连刑部、大理寺都找不到一部完好的唐朝律书时，他竟进献了二百八十六卷唐朝的律令格式。（《旧五代史·刑法志》）。正是由于官藏十分匮乏，才使得后唐那样不遗余力地求书搜书。

同光二年（924年）二月，庄宗定都洛阳尚不足二月，即下令搜访遗书，并命所司立等第酬奖献书者。此诏下后，似乎收效不大，因此时隔二月，枢密使郭崇韬又奏请庄宗“再行敕命，遍下逐道”，并提出了具体的奖酬建议。庄宗于是再次下诏，申明凡“进纳四百卷已下，三百卷已上，皆成部帙，不至重叠，及纸墨书写精细，已在选门未合格人，一百卷与减一选；无选减数者，注官日优与处分。无官者纳书及三百卷，特授试官”（《册府元龟》卷50）。

明宗天成元年（926年）九月，以尚书都官郎中庾传美为三川搜访图籍使，前往平定不久的成都访书。至翌年十二月，得《九朝实录》及杂书传千余卷，并付史馆。《太平御览》卷619

《学校部·采求遗逸》引《后唐史》，记述了这起访书的缘由：“传美，伪蜀王衍之书旧寮，家在成都，便于归计，且言‘成都具有本朝实录’。及传美使回，所得才九朝而已。其全残缺杂书，盖不足纪。”但《册府元龟》卷557《国史部·采撰三》却载云：“同光已后，馆中煨烬无几，《九朝实录》甚济其阙。”所谓“煨烬无几”，当指同光四年四月庄宗被杀时事。

在庾传美于成都访书的同时，刑部郎中王骞于天成二年七月又“奏请采访图籍”。

长兴二年（931年）五月，都官郎中知制诰崔税奏请购募民间野史，以备编修史书。同年十一月，史馆为纂修唐宣、懿、僖、昭宗四朝实录，奏请于两浙、福建、湖广采访以上四朝野史及逐朝日历、银台事宜、内外制词、百司沿革簿籍，“不限卷数，据有者抄录进上。若民间收得，或隐士撰成，即令各列姓名，请议爵赏”（《五代会要》卷18《史馆杂录》）。

鉴于战乱中各地郡邑的变化，明宗还于长兴三年五月，令诸道州府据所管州县，各进图经一本，“其间或有古今事迹、地理山川、土地所宜、风俗所尚，皆须备载，不得漏略。限至年终进纳”（《五代会要·职志》）。

闵帝应顺元年（934年）正月，诏进书官刘常为郑州荥阳令，单骧为唐州司法参军，“今后三馆所阙书，并访本添写，其进书官权停”。（《册府元龟》卷557）由此可知，后唐还立有专门的进书官制度。在此以前，朝廷访求阙遗图籍，多是临时派官前往，冠以“访书使”之类的名衔。而“进书官”虽亦属临时差遣的使职，但已具有明显的专职意义了。由此亦可见后唐对图籍搜求工作的重视。

后唐还十分注重对图书的整理。《册府元龟》卷608《学校部·刊校》载：“后唐杨凝式，明宗天成初为给事中。凝式精选通儒，校定三馆图书。”《宋史》卷263《张昭传》：“（清泰）

二年（935年），加判史馆兼点阅三馆书籍，校正添补。”

后唐朝廷的重视，无疑给图书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，著名的刻印监本《九经》之举创始于此时，绝非偶然。

注：

①《旧五代史》卷57《唐书·郭崇韬传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南开大学历史系

宋《因话录》作者与成书年代

闻人军

《因话录》有同名异书古籍两种，均是笔记小说。唐《因话录》为赵璘所撰，不是本文的讨论对象。南宋《因话录》中有关于我国罗盘（地螺）的最早的文字记载，一再为史界（特别是科技史界）所称引，但其作者“张冠李戴”，成书年代亦有点问题，①有必要改正与澄清。

宋《因话录》十卷，未见传本，仅见于陶宗仪所辑的《说郛》之中，存四十五（或作四十六）条。昌彼得《说郛考》说：“因，明钞本作司，重编说郛本作同，培林堂书目作罔南因语录，不详孰是。”②今查宛委山堂本《说郛》卷二十三记作《同话录》，宋曾三异撰。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明钞本排印的涵芬楼本《说郛》卷十九记作“《因话录》十卷，宋曾三异，字无疑，号云集，新塗（塗为淦之误——笔者注）人。”自陶宗仪《说郛》将《因话录》误题为曾三异所作，《中国丛书综录》等书因之，昌彼得的专著《说郛考》也未发现这一错误。其实，《因话录》